



“娜拉现象”的 中国言说

“Nora phenomenon” of Chinese speech

宋剑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娜拉现象”的 中国言说

“Nora phenomenon” of Chinese speech



宋剑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宋剑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2-011555-6

I. ①娜… II. ①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5503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5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555-6

定 价 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2年3月

目 录

绪论 花开花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命题	1
第一节 女性“解放”的社会想象	3
1. 晚清时期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先声	3
2.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叙事的文学表达	8
3. “五四”以后女性出路问题的多元思考	14
第二节 西方“娜拉”的东施效颦	25
1. 西方“娜拉”融入中国的时代因素	26
2. 西方学界关于“娜拉”的自我认识	32
3. 中国作家对于“娜拉”的主观误读	36
第三节 诋毁“传统”的运作策略	46
1. “五四”启蒙之偶发事件的历史契机	48
2. 中国古代“节烈”现象的真实状态	52
3. 现代文学贬斥“礼教”的偏执认识	58
第一章 青春躁动——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爱欲释放	65
第一节 自私亚当的“欲望”转移	66
1. “婚恋自由”——启蒙话语的受益主体	67
2. “爱之涌动”——男性笔下的女性春心	75
3. “欲之宣泄”——男性臆想的女人性事	82
第二节 真实夏娃的“思春”心语	89
1. “心之感悟”——女性作家的本能诉求	91
2. “情之写意”——女性作家的浪漫遐想	96
3. “言之暧昧”——女性作家的情感表述	103
第三节 《海滨故人》的文本价值	110
1. “海滨”意象——女性向往的自由意境	113
2. “爱情”叙事——难以言表的苍凉体验	117

3. “故人”惊梦——灵魂哭泣的绝望悲鸣	120
第二章 闺怨诉说——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苦闷象征	125
第一节 “闺房”情愁的一声叹息	127
1. “红颜”待阁——高墙深院的孤影自怜	128
2. “家长”权威——抑郁寡欢的惆怅思绪	135
3. “他者”缺席——自我独饮的一杯苦酒	141
第二节 “婚床”苦闷的几多哀愁	147
1. “寂寞”之苦——望穿秋水的孤独守望	147
2. “冷落”之痛——激情褪尽的凄凉感觉	153
3. “受骗”之恨——泣泪洒血的颓唐心境	160
第三节 “情殇”体验的绝望悲鸣	168
1. “知识误我”——反思启蒙的自省意识	168
2. “看破红尘”——婚恋理想的彻底破灭	175
3. “认命现实”——自我咀嚼的性别之苦	181
第三章 红娘现象——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历史传承	189
第一节 “红娘传书”的文化情结	191
1. “为人为己”——古典叙事的双重含义	191
2. “版本升级”——穿越时空的情女幽魂	197
3. “形象变体”——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	204
第二节 “贪婪牙婆”的千古骂名	211
1. “海淫海盗”——古代牙婆的形象定位	211
2. “罪恶之身”——现代媒婆的艺术呈现	217
3. “移花接木”——媒婆形象的职能转移	223
第三节 “公媒人物”的艺术书写	229
1. “州县议婚”——古典文学的传统范式	230
2. “政府撑腰”——现代公媒的政治色彩	235
3. “尊者主事”——公媒人物的延伸拓展	241
第四章 私奔出走——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理想终结	249
第一节 “自主婚姻”的千年渴望	251
1. “欲望叙事”——私奔现象的古代释义	251
2. “婚恋自由”——私奔现象的现代形态	257
3. “个性解放”——私奔现象的启蒙功能	264

第二节 “理想爱情”的古今诉求	272
1. “巫山云雨”——魂奔叙事的神话色彩	272
2. “一帘幽梦”——魂奔叙事的审美变迁	278
3. “长夜难眠”——魂奔叙事的心灵之声	284
第三节 “子君悲剧”的历史警示	290
1. “逃避孤独”——涓生形象的文本释义	290
2. “寻找归宿”——子君形象的文本释义	294
3. “感悟人生”——鲁迅本人的思想困惑	298
后记	302
参考文献	306

绪论 花开花落——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女性命题

1907年,辛亥革命女英烈秋瑾创办了一份《中国女报》,正式拉开了中国女权运动的悲壮序幕。秋瑾女士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开明宗义,中国现代新女性全力主张“人权天赋原无别”,强烈要求“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进而在华夏大地上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政治理想。^① 当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则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② 因为在毛泽东本人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妇女能顶半边天”,真正消灭历史悠久的性别歧视。所以,他还专门赋诗一首《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充满着阳刚之气的豪迈诗篇,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一种无比的自信——新中国妇女由“爱红装”到“爱武装”,这恰恰是男女平等社会制度的集中体现,故在毛泽东那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想象中,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也应画上一个“圆满”的符号。

问题果真是如此简单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了。

女性解放运动是19世纪起源于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终极目的不是要同男性去争夺这个世界的统治权,而是要通过女性自身不懈地努力和不懈地斗争,使男女之间由“统治关系模式”变成“伙伴关系模式”。^③ 实际上,女性解放是个至今仍没有定论的复杂命题。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因为她是“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性别”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理现象。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

① 《秋瑾集》第46—4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原载于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通讯:《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

③ [美]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就曾指出,女人的“雌”性特征使其身体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女人的身体是限定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① 故她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则是因为她“被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权利”失衡,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文化现象。自从“在私有制的基石上诞生了父权制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女人变成了被征服者”。^② 故女性社会群体生理和文化方面的双重弱势,便成了西方现代人文关怀的重要因素。

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历史,“女性解放”是文化变革的辅助成分,它并不是源自于知识女性群体的自觉意识,而是依附于男性启蒙精英的拯救意图。因此这种由男性社会所主导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便将女性置于了一种十分不利的尴尬境地——只能是“听将令”唯男权话语的马首是瞻。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全民族的洗心革面与救亡图存,故男性启蒙精英大力倡导“首在立人”,“女性解放”必须服从“民族解放”,否则根本就不具有其实际意义。比如从“晚清”到“五四”,学界都将女性罹难归结为是孔孟之祸,“‘三从’‘四德’之谬训”均是始于儒家伦理。^③ 既然是与孔儒学说息息相关,那么它也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也就决定了“社会”大于“女性”的解放意义。男性启蒙精英正是以此逻辑为立论,要求“国民半数的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④ 并把她们参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看作是衡量新女性义务与权利的交换筹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全都放弃了“自我解放”的精神诉求,而去自觉地认同男性群体“社会解放”的政治主张,其结果最终导致了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自我消解。辛亥女英烈秋瑾从“奔走呼号于我国同胞姐妹”,^⑤ 到“千金市得宝剑来”去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暴力革命,其所表现出的那种“死生一事付鸿毛”的英雄气概,早已扫荡了她为女性解放而“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忧患意识。现代女作家丁玲也从沉迷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清醒过来,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作为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者,她甚至感到被别人视为“女性”是一种耻辱。^⑥ 由此可见,无

①②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第12、22页,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载1904年4月《女子世界》第4期。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秋瑾集》第1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⑥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曾说:“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来呢?”见《丁玲文选·莎菲女士的日记》第3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是秋瑾还是丁玲,她们都在努力地消泯性别意识,从“女性解放”转向到了社会革命,并试图从社会革命中去获得“自我解放”。这种迷失自我而去依附于男性革命话语的奇特现象,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一大悲剧。其实早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有智者向女性发出了善意的忠告:“愚者不察,妄谓女子之解放,出于男子之意,以颂男子之恩德。——名为解放,实则解放之权属于他人,不过为男子所利用,而终为其附属物而已。”^①因为在他看来即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男性与女性之间仍旧是一种“统治关系模式”,而不可能是一种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模式”,“女性解放”仍旧是个遥遥无期的理想彼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或女性题材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一面镜子,它从悲壮地反叛“出走”到盲目地乐观“回归”,清晰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真实状态,男性启蒙精英用他们变革社会的拯救意识,直接影响着女性知识精英自我觉醒的主体意识。女作家杨沫以其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真实地讲述了中国现代女权运动的心路历程——女性绝不可能自己去解放自己,她必须具有一个男性导师。所以林道静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也就成了新女性思想“成长”的生动写照。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把新女性称作是中国的“娜拉”,其目的无非就是要突出她们自我解放的西方色彩。然而,中国并没有“娜拉”存在,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要从家庭走向社会,去做一个完全“独立的人”。而中国新女性的追求则是,走出“父家”去寻找“夫家”,只要能够得到婚恋自由的决断权利,她们就会像子君一样心满意足了。这不仅使我想起了黄庐隐在《海滨故人》中连续两次发出的“知识误我”的深深感叹,究竟是她本人的绝望悲鸣,还是新女性的觉醒呐喊呢?因此重新回到历史的原场,我们将发现事实的真相。

第一节 女性“解放”的社会想象

1. 晚清时期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先声

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发轫,最早始于1876年《申报》“兴办女学”的社会讨论。该报于当年的3月30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隸华书屋”

^① 震述:《女子解放问题》,载1907年《天义报》第7—10期。

的长文《论女学》，立即在上海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棣华书屋”在文章中指出：“泰西诸国亦向有女学，而今则日盛一日。——美国各书院中女师、女徒多至三百余万，可谓盛矣。德国女子生八岁例必入塾。——万国人民以中国为最多，妇女中不乏天资敏悟之流，惟无一倡之，终归隐没耳。”在“棣华书屋”看来，中国女性社会地位之卑下，“推原其故，因女子无学，人皆贱之”。该文一出，应者云集，论辩之风，不绝于耳。到了1878年，《申报》又组织文章，对女子参与社交问题，再次展开热烈讨论。1897年春天，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更是在上海女界，刮起了一场“天足运动”。正是在这种女权运动的影响之下，金雅妹、许金匄、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位教会女生，在19世纪末率先漂洋过海赴美留学，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留学生。从此以后，国内“女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感召之下，已经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自然要“出墙来”！

晚清末期到民国初期的女权运动，主要还是体现为妇女解放的“本土化”，即从改造民族劣根性的立场出发，去倡导“国民之母”为“新民之本”的现实意义。“新”一国之民首在解放“国民之母”，此说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口号，它最早源自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女学》，在主张“新民说”的梁任公看来，“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①梁启超乃是晚清思想界的启蒙泰斗，他有关国家与民族变革的任何说教，都会令热血青年顶礼膜拜激动不已。比如，化名为“竹庄”的作者，便在《女子世界》上撰文响应说：“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②又如，化名为“亚特”的作者，也在该杂志上撰文响应说：“国民果若何以生，若何以支配，其果伟大，其因远且长。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③当然，知识界虽然对梁启超“国民之母”的启蒙思想深信不疑且大加赞誉，同时他们还根据自己的丰富想象，对此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学理探讨：

吾尝考验女学生之性质，而知年幼女子之锐敏于学，远过于男学生；而其感觉之灵敏，爱力之团结，则又非男子之性情涣散各私其私之可比。则信乎中国女子非不可教，惜其埋没数千年，虽有英杰之姿，亦

① 《饮冰室文集》第1集第4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载1904年4月《女子世界》第4期。

③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载1907年7月《女子世界》第7期。

不可得见。今女学萌芽,仅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而已崭然显其才智也。又惜乎中国如是之大。而仅仅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恐教育未能普及,而我国之亡已久矣。然大病垂危,医药终不能废,吾犹幸及见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而希望多数女学生,接踵而起也——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依赖于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望也。^①

从这段开启女学的话语言说中,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论者认为女性并不比男性愚笨,甚至还要比男性更加聪明,只不过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偏见,她们之过人天赋才难得展现而已;其次,论者强调营造“国民之母”,应使女学教育全面普及,只有广大女性都能“接踵而起”,“新民”之说才能够真正实现;再者,论者鼓励中国女性应自强自立,彻底摆脱对男性社会的强烈依赖,勤奋学习立志高远报效国家参与革命,并力争成为拯救全民族的女中豪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们才会乐观地宣称:“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则我女子世界发达之一日,即为我国民母发达之一日。”^②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男性启蒙者也向女界发出呼吁说:“处今日女子革命之时代,吾决不望女子仅获伪自由、伪平等也,吾犹望女子取获真自由、真平等也!”^③这等于明确地告诉女界,在“反清排满”与“女性解放”之间,必须先弄清楚孰轻孰重之关系,因此他们要求女性群体暂缓一己之要求,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且有所贡献。秋瑾在其《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便直白地表达了她对这一问题的认同态度——女性自由权利的获取程度,直接与其承担的责任相等。故她在《勉女权》诗中铿锵有力地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光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欺无负。”^④难怪有学者曾这样评价说:秋瑾把妇女平等权利和从军报国义务,视为一种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因果关系,在她们那一代的知识女性身上,

① 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载1904年4月《女子世界》第4期。

②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载1907年7月《女子世界》第7期。

③ 震述:《女子解放问题》,载1907年《天义报》第7—10期。

④ 《秋瑾集》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排满革命与妇女运动两者是不可分的”。^①

由于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自为的审美形态,它的艺术价值必须依赖于它的社会价值才能得以显现,故晚清末期与民国初期的女性文学或女性题材创作,基本上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那一时代思想启蒙的鲜明特征。作为男性精英作家他们所关注“女性解放”的艺术焦点,无疑就是描写中国女性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心灵痛苦,他们极擅长将女性主人公置放于一种自我冲突的矛盾状态中,并以其抑郁而死或殉情自杀去表现礼教吃人的残酷现实。在这一方面长篇小说《玉梨魂》虽然是出自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之手,但却以凄婉哀艳的爱情悲剧,尽情演绎了“女性解放”的精英意识。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分子何梦霞,到一位乡绅家中去当家庭教师,并与学生家长、年轻貌美的寡妇白梨影产生了相见恨晚的真挚爱情。他们二人花前月下坠入了情网,却又碍于礼教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梨影抑郁寡欢病重而死,梦霞也在武昌起义中中弹身亡。仅就小说本身的情节而言,真可谓情意绵绵、哀怨动人,但我个人所要关注的重点,则是小说中两位不同女性的思想与人格。白梨影自然是个旧时代的不幸女性,她爱何梦霞却又仅限于发乎情而止乎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梨影非无情者,而敢负君之情,不以君为知己,但恐一惹情丝,便难解脱,到后来历无穷之困难,受无量之恐怖,增无限之懊恼,只落得青衫泪湿,红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长期以来高墙深院锁清秋的封闭生活环境,在白梨影内心深处投下了巨大的文化阴影,她情感与性格上的优柔寡断不仅牺牲了自己和何梦霞,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了她那年幼的儿子使其变得十分孱弱。与其构成对立面的是新女性崔筠倩,作为白梨影的小姑子她同情嫂子的痛苦挣扎,极力暗示白梨影要挣脱传统观念的思想羁绊,去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个人幸福。当白梨影问她“嫂处深闺,亦知世界文明,结婚亦尚自由乎”时,崔筠倩的一番回答则几乎就是新女性的解放宣言:

旧式之结婚,待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两方面均不能自主。又有所谓六礼三端问名纳彩种种之手续,往往有客散华堂,春归锦帐,我不知彼之才貌,彼不知我之性情,配合偶乖,终身贻误。糊涂月老,误却古今来才子佳人不少矣。今者欧风鼓荡煽遍亚东,新学界中人,无不以结婚自由,为人生第一吃紧事,此求彼允,出于两方面之单独行为,而父母

① 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载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第348页,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版。

不得掣其肘，媒妁不能鼓其舌。即婚之后，虽生离死别，彼此均无所怨——

崔筠倩绝非是仅对其嫂进行思想说教，她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做出典范，当白梨影劝她听从父命安心嫁人时，崔筠倩立刻义正词严地给予了驳斥：

妹非染新学界习气，失却女儿身份，喜谈自由，故违父命；实以此事关系甚大，家庭专制之黑暗中，不知埋歿煞几多巾幗！妹自入学以来，即发宏愿，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专制，以救此黑狱中无数可怜之女同胞，原非仅仅为一身计。方欲以身作则，为改良社会之先导，而身反陷之。可痛之事，孰有甚于此者！妹固无以自解，更何词以塞同学之口乎？

毫无疑问，崔筠倩的上述反叛之言，几乎就是拯救“国民之母”说的艺术翻版，白梨影囿于传统且对其儿子施教于传统，与崔筠倩一定要冲破家庭牢笼重塑自我，显然是构成了新旧女性截然不同的人生姿态——因为在徐忱亚等男性启蒙者看来，如果崔筠倩自身获得了解放，那么其后代也就随之获得了解放，这既是小说《玉梨魂》的社会价值，同时也是男性替代女性的解放言说。

与男性启蒙精英对新女性的热切期待相比较，精英知识女性则表现出了一种“巾幗不让须眉”的豪放气概。“五四”以前的女性作家其实并不是很多，但仅以秋瑾诗歌为例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了。秋瑾诗歌是她社会革命理想的集中体现，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热情洋溢的阳刚之气，令人读罢掩卷而思其“斩尽妖魔”的飒爽英姿，无限感慨之余又多了些令男儿泪流的愧疚之色。秋瑾诗歌首先是充满着一种女儿当自强的人格意识，比如《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一诗：“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其次秋瑾诗歌里充满着女性建功立业的伟大理想，比如《对酒》一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再者秋瑾诗歌中还洋溢着强烈无比的爱国主义情怀，比如《红毛刀歌》一诗：

一泓秋水净纤毫，远看不知光如刀。

直骇玉龙蟠匣内，待乘雷雨腾云霄。

传闻利器来红毛，大食日本羞同曹。

濡血便令骨节解，断头不俟锋刃交。

抽刀出鞘天为摇,日月星辰芒骤韬。
斫地一声海水立,露风三寸阴风号。
陆专犀象水截蛟,魑魍惊避魑魅逃。
遭斯刃者凡几辈?骷髅成群血涌涛。
刀头百万英雄泣,腕底乾坤杀劫操。
且来挂壁暂不用,夜夜鸣啸声疑鹞。
英灵渴欲饮战血,也如块磊需酒浇。
红毛红毛尔休骄,尔器诚利吾宁抛。
自强在人不在器,区区一刀焉足豪?

从这些杀气十足的诗歌当中,秋瑾以其慷慨激昂的磅礴气势,使我们真正领略到了这位辛亥革命的女豪杰,绝不输于男性仁人志士的英雄气质。同时,她更是以自己敢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向人们展示了新型“国民之母”的辉煌曙色。

2.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叙事的文学表达

与清末民初拯救“国民之母”的社会呐喊遥相呼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从全面反传统的思想认识出发,再次把女性解放纳入到了国民解放的社会范畴,进而也极大地消解了中国女权运动的性别意识。《新青年》杂志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媒体,从其发刊伊始便十分关注妇女问题,比如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高素素的《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梁华兰的《女子教育》、吴曾兰的《女权平议》、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望道的《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等文章,在他们那言辞犀利的论述当中,都是以女性群体的“自立”程度,去衡量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即“社会学重要之论点,即妇女问题是也。妇女占人类半有之数,社会对于妇女之情形如何,足征文明之进化与否”。^①毫无疑问,在“五四”启蒙精英的主观意识里,女性占据了全社会的一半人数,如果忽视了这一群体的客观存在,那么社会解放也就无从谈起。故他们声称即使是“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②这就是导致“五四”时期男性启蒙者,主动替女性去言说“解放”的根本原因——男性是“智者”而女性是“愚者”,男性是“先觉者”而女性是

① 华林:《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载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② 周作人译:《贞操论·译者前言》,载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号。

“落伍者”。男性启蒙者把弃“贞操”而废“节烈”，作为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广泛的讨论，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性别歧视问题，而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1914年袁世凯为了复辟称帝，颁布了一个所谓的《褒扬条例》（共九个款项），该《条例》试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去规范社会行为进而全面复古。其中第三条款项就清楚地写着：“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五四”时期弃“贞操”与废“节烈”的时代呼声，完全是隶属于启蒙者反封建的客观要求，女性解放也只有在“人”之解放的基础上，才会凸显其超越性别意义的时代价值。在男性启蒙精英的思维意识中，西方现代社会的男女平等，是西方女性“自立”的必然结果；“自立”意识方能使西方现代女性，“起而同男子服务于国家社会”^①。可当今世界，“唯吾国旧习，亘古不以女子为人格；女子亦不敢以人格自居”。^②所以胡适在其《美国的妇人》一文中，向中国女界提出了人格“自立”的强烈期待：

如今所讲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她们的自立心，只在她们那种“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文明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我们中国的姊妹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足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来补足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以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

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像那传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③

但是，胡适这番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有一细微变化处却不应被忽视，他从女子“自立”过渡到男女“自立”，笔锋一转便使命题概念发生了质变——“性别”解放已经不再是他慷慨言说的中心思想，而“人”的“自立”才是他突出强调的“意义”重心。尽管“女子”与“男女”只是一字之差，可其位置却被放在了“男人”之后。无独有偶，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里，虽然也对女子“节烈”之荒谬性进行了口诛笔伐，然而在其文章结尾之处他

① 吴曾兰：《女权平议》，载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4号。

② 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载1915年《妇女杂志》第1卷第8号。

③ 载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号。

也表示：“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即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也要使“人类都受到正当的幸福”，^①“性别”意识更是被升华到了“人类”意识。全面浏览“五四”时期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著述，几乎所有论点都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女性苦难深重必须“解放”，女性“解放”又事关人格“自立”，而人格“自立”则还需获得经济支撑！在这一系列的逻辑链条里，有个关键因素却被省略掉了——谁才是女性解放的主宰者？回答当然是那些男性启蒙精英！不过，在当时男性启蒙精英还没有自我“解放”时，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去“解放”女性呢？这无疑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命题”！

“五四”新文学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题材创作，恰好反映出了他们对女性解放“伪命题”的自我否定意识。我们不妨以鲁迅的小说《祝福》与《伤逝》为例，去对其批判理性精神进行一番深刻地解析。作为男性主人公读书人的“我”，非常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我”知道祥林嫂结过两次婚，儿子阿毛也给野狼叼走了，鲁四老爷因其“晦气”将其逐出了家门，最后使她流浪街头冻饿而死。“我”虽然从祥林嫂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却始终没有为她去解答“地狱”是否存在的古怪想法。学界以往只是将这篇小说从礼教“吃人”的角度去加以解读，固然不失为是一种强化鲁迅启蒙思想的极好思路；但我们绝不应该超越作品文本去神化鲁迅，而对鲁迅作品文本进行断章取义的人为曲解。鲁迅在回答“我”为什么逃避祥林嫂的苦苦追问时，还有这样一段语义隐晦的含蓄交代：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以用这说不清来做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②

① 载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② 《鲁迅全集》第2卷第1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